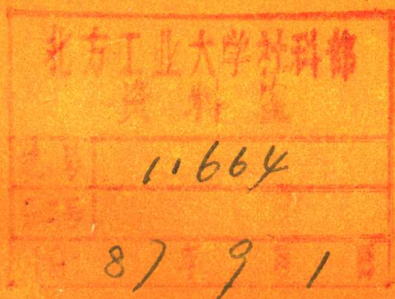


福建党史资料

第四辑

(629)



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

福建党史资料

第四辑

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 编

一九八六年二月

目 录

- 1、序..... 张明俊 (1)
- 2、我党在泉州利用“监察署”和“抗敌
会”开展活动情况.....辜仲钊 (3)
- 3、献身祖国的革命事业——我，一个爱
国归侨的自述.....洪雪立 (9)
- 4、惠安暴动的前前后后..... 兰飞凤 (25)
- 5、回顾我在泉州地区的革命斗争..... 粘文华 (40)
- 6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安南永德革命斗争
忆述..... 翁成金 (50)
- 7、在安南永德地区的革命斗争..... 尹利东 (63)
- 8、安南永游击队后期情况的回顾..... 彭德清 (73)
- 9、惠安革命斗争史略忆述.....朱汉膺 (81)
- 10、回忆安同南边区的革命斗争..... 白凤毛 (91)
- 11、“泉州事变”前后.....黄国璋 (101)

12、奔赴祖国抗日前线

——忆菲律宾华侨“劳联会”回国慰

劳团……………郭 健(106)

13、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革命斗争概况的回

忆……………许集美(115)

✓14、闽西南白区党十三年回忆……………张 连(172)

15、回忆四十年代惠安的革命斗争……………张海天(192)

16、德仙永边区游击斗争回忆……………毛 票(203)

17、从攻打安海到深按突围……………朱义斌(215)

18、戴云山战斗的艰辛历程……………傅维葵(227)

19、闽粤赣纵队八支四团十四连的斗争历

程……………梁新民 林金狮(234)

20、泉州劫狱斗争事略……………颜嘉祥(240)

21、忆泉州劫狱斗争……………霍劲波(253)

22、忆刘突军……………杨采衡(266)

编后语……………(274)

序

张 明 俊

泉州位于福建东南部，是我国古代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城市，历史文化名城，著名侨乡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泉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压迫，争取人民民主与民族解放，长期坚持艰苦卓绝、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，正气浩然，前赴后继，终于迎来了全区的解放，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侨乡人民的胜利凯歌。

早在一九二二年冬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俞秀松就来泉州，传播马列主义，播下了革命火种。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，泉属各县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厦门等地读书的学生和海外华侨青年，接受党团组织的委派，纷纷回乡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。一九二七年一月，中共泉州特别支部建立。随后，惠安、南安、同安、永春、德化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，并建立了工会、农会、妇女协会、学生会、反帝大同盟等群众组织，有效地开展了人民革命斗争，声势浩大，革命烽火燃遍城乡。

历时十年艰苦卓绝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全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、几经曲折，曾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。一九二九年八月，朱德率领红四军入德化、永春，鼓舞和推动了全区人民的革命斗争，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，永春鳌峰农民武装抗捐斗争，永春东区农民运动，惠安农民武装暴

动，李南金等开辟的安南永边区和晋南边区农民运动都有很大发展。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漳州后，极大地推动了安南永德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，在这里形成了纵横二百余里、人口三十余万的赤色区域。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及各地游击队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当地人民的支援下，英勇奋战，取得节节胜利。与此相呼应的晋南同边区游击战争，惠安农民武装抗捐，泉州白区斗争也紧密配合，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“围剿”斗争和红军胜利长征。

抗战八年，泉州党组织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了不懈努力，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。党的队伍在艰苦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，培养积蓄了党的干部、坚持战斗，直至抗战胜利，并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泉州地区的党组织有两个系统，分属闽浙赣省委闽中地委和闽粤赣边党委闽南地委领导。在泉州中心县委、安溪中心县委的分别领导下，建立了人民游击队，广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，摧垮了全区大部份国民党乡镇政权，有力地截击了国民党的南逃溃军，先后解放了安溪、永春、南安、惠安、晋江（泉州）等县城，与解放军胜利会师，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，并积极发动群众支前，进行了英勇的战斗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《福建党史资料》第四辑，汇编了泉州地区早年参加战斗的革命先辈以亲自经历撰写的文章。这些文章朴实、生动地记述了泉州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，热情歌颂了革命先辈和人民群众在长期的浴血奋战中的英雄事迹，为研究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，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是对广大党员、干部和群众进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，我们全区人民要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为振兴泉州，建设侨乡，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，再谱写“四化”建设的新篇章。

我党在泉州利用“监察署”和 “抗敌会”开展活动情况

辜 仲 釗

一九二六年，我在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七月，随国民革命军北伐，是年冬回到泉州。

一九二七年一月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政治部在泉州设立了“兴泉永政治监察署”，陈文总（国民党左派）任政治监察员。我党派唐沙白（李松林）、左明亮（左光明）参加监察署。我经陈祖康（后叛变）的介绍，也参加监察署的工作。我们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，宣传革命道理，发动民众，打击土豪劣绅，并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我们以泉州为中心，分头出城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活动。我与唐沙白、左明亮、侯汉雄经常到北门外的印塘、新门外的树兜和南门外的清蒙、柴塔、御辇、池店、新店、青阳、沙塘等地宣传革命道理，指出农民之所以生活贫困是由于军阀、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的压迫剥削。为了使农民团结一致，我们发动他们组织农民协会，废除苛捐杂税，与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作斗争。我们发动南门外的农民缴获了一个姓陈的土匪的枪支；派两位同志到惠安动员群众去抓姓陈的土劣（未遂）；发动北门外四、五百名农民到县政府请愿，要求豁免果树捐和房屋税；镇压同安罪

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陈剑经。于是，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，在宣传发动活动中，同志们一心一意为革命，不爱官、不爱钱、不怕死，朝出暮归，经常工作到深夜。

这时，国民党逼于形势，也宣传要组织“农会”，但他们骑马坐轿带兵下乡，农民早都跑光了。

我们不但开展农民运动，还深入工人、学生中，领导他们开展工运、学运。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组织了自己的工会，与工头、资本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如晋江全县(包括今泉州市)工人在明伦堂成立总工会，唐沙白还远到安海，组织汽车公司工会；我也曾带领工人游行示威。学生运动搞得最出色的是我任教的西隅学校，陈祖芬等人在这里建立了学生会，领导学生运动。

我党利用监察署这一合法有利的条件开展工作，泉州革命运动如火如荼，形势喜人。对此，国民党右派又惊又恨。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性愈加暴露，开始背叛革命，破坏民众运动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，厦门清党事件发生。四月十日，国民党晋江县党部当局也在泉州召开闽南十一县国民党联席会议，宣布“护党拥蒋”，取缔民众运动。“清党”事件发生时，我们事先接到闽南特委的通知，绝大部分同志都及时分散到农村，使党组织免受损失。我和左明亮、唐沙白先后到南门外的清蒙乡，一边领导农民运动，一边观察形势。后又转移到同安马巷一带开展农民运动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，陈祖康叛变。年底党即派张晓川、洪学礼(雪立)到泉州继续领导革命斗争。这年，因陈叛变，我和唐沙白身份暴露，把工作移交给彭甘杏，即离开同安，到南洋去了。

一九三六年，我从南洋回国。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泉州国民党当局成立“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晋江分会”(简称抗敌

会)。该会由各党派联合组成，实行主任委员制，有常务委员十余人。国民党晋江县党部书记庄澄波为主任委员，县商会会长蔡鼎常，教育界代表陈泗荪为副主任委员，袁延年为秘书长，尤拱堂为秘书。委员会下设宣传、募捐、慰劳、救护、生产、侦察、总务等股。

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，但是共产党在泉州仍得不到承认，不能公开活动。我党利用“抗敌会”这一合法组织，开展活动，发展组织，创建群众武装，准备抗日游击战争。泉州党的负责同志李刚决定要我利用一九一六年在反袁“民军”中与张贞等人的工作关系，以灰色面目参加“抗敌会”，並任“抗敌会”慰劳股干事。

慰劳股是由吴桂生等人负责，募捐股赵祖建负责，宣传股陈泗荪负责。但他们都是挂名而已，不大管事。慰劳股和宣传股实际上由我和陈盛明分别负责。我通过慰劳股，把募捐、宣传、救护这几股的实权抓了起来。这样，我党就顺利地运用“抗敌会”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

一、宣传工作：主要以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为骨干，以学校的广大师生为主力，建立各种宣传队、歌咏队、晨呼队、戏剧队和巡回剧团等群众性宣传组织，经常下乡宣传抗日，各地还广泛创办各种夜校、民校和补习学校，深入开展宣传工作，对群众进行抗日教育。

“抗敌会”还创办了《抗敌周刊》和《抗敌会报》等革命刊物。各校也在街头、广场等公共场所大量出版了以宣传抗日为中心内容的壁报。

在宣传活动中，我党党员起着主导作用。邓家梁、章绿汀、朱斐、何碧华、谢盖仁（谢怀丹）、白震、唐加沙等人都很活跃，掌握了北门梅石镇、新门外树兜乡等地的公开群众武装。在

白震的帮助下，泉州知名音乐人士盛保罗组织了晋江抗敌歌咏大巡行。李刚掌握了《泉州日报》，该报总编朱少稀（民主人士），主编顾惠生、李铁和编辑李展等人都是我党党员。他们主办了《抗战导报》，成为我党报刊。一九三八年五月，厦门沦陷，《江声报》社迁来泉州，我党派王宣化、辜洪涛到该报当编辑。章绿汀还在民生中学等学校做战时妇女工作。

二、募捐工作：主要是通过宣传、义卖等方式进行募捐。由于宣传工作做得较好，故募集大量的食品、医药、各类衣服、毛巾、牙杯、牙刷、鞋子、金银首饰和现款等支援前线。

三、慰劳工作：我们把募集来的物品和现款慰问金门、厦门难民及本地受敌机轰炸的难民，也到沿海各地慰问驻军。

四、救护工作：当时设有防空警报队、担架队、消防队、医疗队、救护队、纠察队、掩埋队等组织，一遇空袭，就各自执行任务。

总之，这一时期，我党全部用“抗敌会”名义开展工作，把“抗敌会”搞得象泉州人民的抗日活动指挥部一样，群众对抗战有什么问题或要打听什么消息，都到“抗敌会”来。

通过“抗敌会”的活动，我党控制了梅石、树兜、浮桥等三个联保。通过树兜联保主任蒋报捷的工作，我党又掌握了新门外的新华、高峰、惠群、紫兰、紫岫等小学，有计划把“厦青团”来的一些同志和本地一些党内同志安排到这些小学当老师。这样，我党控制了浮桥、树兜一带的革命群众，在这一带工作畅行无阻。粘文华和我都经常到这里活动，並曾在树兜开一个几十人参加的党员代表大会。

厦门沦陷后，晋江、南安等地形势紧张。我党为了保卫晋、南人民的生命财产，决定准备进行抗日游击战争，並在南安深坑乡（今属官桥镇）召开了晋、南两县二十二个联保的代表大会，出席大会的有各联保主任和热心抗日的人士，共约数十人。大会

由李刚主持，粘文华和我也参加。会议决定建立晋、南联乡抗日群众武装，成立晋、南边区游击指挥部，各联保募筹经费，准备储粮，主要由蒋报捷、陈正宗负责。深坑地势险要，有较好的二战时期革命斗争的群众基础，是一个理想的抗日游击根据地，决定一旦日寇登陆，即以深坑为根据地，开展游击战争。

会上，各联保代表签名发表了《宣言》，并通过了“晋、南联乡抗日群众武装”的组织章程。会后，各联保立即分头进行组织动员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支一、二千人的抗日群众武装，並配备了各式各样的武器。
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广州、武汉失守后，国民党蒋介石逐渐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。泉州的国民党顽固派钱东亮、庄澄波等人对抗日的进步人士进行各种打击和迫害。有一天，国民党中央派人来泉州检阅“抗敌会”，我正好在布置会场，一个国民党便衣特务突然递张条子给我说：“钱副师长请你到卫戍司令部。”我去时，在场的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庄澄波、县商会会长蔡鼎常等人。他们问我搞些什么工作，到过那里。我答：“搞抗敌慰劳工作，到过后方、前线进行慰劳。”他们说：“有人告你造谣、破坏军誉，还参加过‘闽变’。”我向他们要证据，他们没有证据，不得不将我释放。次日，《泉州日报》即报道：“党政军三司会审辜仲钊”的消息。过后不久，庄澄波对我说：“省党部指令，你有异党嫌疑。”要我辞去“抗敌会”的职务。我和李刚商量后，决定辞职。这时国民党四区党务督察专员李爱黄又假惺惺地对我说：“你如果不是共产党员，登报声明一下就没有问题了。”我答：“如果我是共产党员，你们早已抓我了。既然不是，何必登报。”

我们退出“抗敌会”后，国民党就把“抗敌会”牌子移挂到县党部门口，从此，“抗敌会”名存实亡了。此后一个阶段，我

们仍然继续活动，传阅过《新华月报》，讨论过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的光辉著作。

一九四一年初、李刚离开了泉州，泉州中心县委书记由许运伙接任。不久，我也离开泉州，本想到陕北，后来在闽北遇上粘文华，就在那里参加了革命活动。

献身祖国的革命事业

——我，一个爱国归侨的自述

洪雪立

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五日，我生于福建南部的一个小县城——南安丰州镇。

我是个独子，出生后由父亲指给守“生寡”的伯母做继房子。母亲和伯母把我看为“性命根”，是传宗接代的承继者。小时伯母对我管教极严，她说：“宁无子，不要坏儿子。”长年把我关在房里，不准出门，也禁止同邻居小孩玩耍，怕被人带坏。我有时带着好奇心，偷着出去玩，她总是尾追着来，严厉斥责，不管你有什么兴趣，都是强迫回家。

九岁那年，我进私塾读书。然而，穷困迫着我从私塾里走出来。不安现状，不满现实的思想在我童年强烈地存在着。

我十四岁了，母亲认为一封信写得来，算盘会打，就得出洋。她想了许多办法都没有实现，后来把我送到一家布店当学徒。

当时，在丰州镇里，人口不满三千。官吏胥役，警兵狱卒，就占五分之一以上，因此小城里的商人和衙门多少总是有些关系。所有商店直接间接做了衙门官吏兵丁的供应工作，社蠹成鼠，包捐包税的也常以商人身份出现。我的布店老板主要是靠衙

门发迹的，包揽诉讼，承办捐税，也做什么“禁烟委员”、“商会会长”等等。我在那里当了三年学徒，看到了许多违情悖理的事，如纳贿受贿，敲诈勒索，“禁烟委员”竟然私运烟土等等。

因邻居失火，布店全部烧光。我被解雇了，就由堂亲介绍到同宗洪福家里做书童和助手。洪福是个“吸血鬼”，我怎能做他的助手呢？

就在这时，我沉醉于传奇小说了。崇拜往昔那些路见不平，劫富济贫的侠客；那些卫国御寇，忠义正直的英豪。而对那些作奸犯科，窃国陷贤的奸佞，则加以讥刺痛斥。我在童稚意识里，强烈地燃烧着远走高飞的念头。

大约是一九一八年，闽南各地民军蜂起反对北洋军阀。福建省督军李厚基是北洋军阀的一派。这时活动在晋江、南安、安溪、永春等县的民军，较大的一股叫做“靖国军。”两边“讨伐”和“征剿”，都加重了人民的痛苦。我们这个小城就在两军相峙之下，弄得狗走鸡飞。城里是北洋军队筑垒据守，城外则是靖国军活动地带，几乎每天都有战斗。我家搬到大姐家避难，我也失了业。

第二年秋天，为了解除失业的痛苦，我跟陈莲汀（已故）投奔靖国军。当时靖国军领导人之一的许卓然（同盟会员，辛亥革命后，参加“反袁护法”斗争，国民党改组时，出席了第一次全代会，一九三〇年在厦门被暗杀）住在安海。我跟陈莲汀到安海后，被分配到洪濂镇当县政府抄写员。不久，靖国军和北军大打起来，洪濂镇为北军占领，我又失业了。

一九二〇年端午节，我的结拜兄弟杨金城（已故）到厦门，准备出洋。我托杨父为我贖购一张船票，跟杨去新加坡。

“五卅”以后，海外华侨受到国内革命浪潮的影响，对国民军的看法逐渐有所改变。北伐军节节胜利，收回汉口英租界。海

外华侨扬眉吐气，椰城闽侨成立一个“中国国民党爪哇支部红牌分部”。我也参加了。

一九二七年间，我回到厦门，带着所谓“爪哇支部”的介绍信，准备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，献身于祖国的革命事业。那时在海外受到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蒙蔽与武断宣传，只是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来了解国民党，对蒋介石发动的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毫无所知，对他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窃据政权，也没有认识。可是踏进国门，就觉得情况不对头，厦门马路上除了贴一些“打倒西山会派……”、“拥护……”之类的红绿标语外，闻不到一点革命的新鲜气息。我在厦门住了一个星期，和七年前所看到的没有什么异样，于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老家。

那时南安县治还未迁移，我所看到的是，旧式绅士已被另外一批所谓“党务指导员”代替了。他们的作为和旧绅士包揽诉讼，操纵县政并没有什么分别。特别令人恶心的是，教育机关被当作政争的工具。故乡唯一的县立小学，学生常被他们利用去摇旗呐喊。今天甲派得势，利用小学生拿着五彩色旗表示拥护甲派；明天乙派得势，也以同样方式压倒甲派。三两天就有一次示威游行，真是闹得乌烟瘴气。县党部、县政府、教育局、县商会、县立小学便是这些新式社蠹的争斗场地。我观察了解二个多月后，认识到国民党的“庐山真面目”，失望了，索性把爪哇支部给的临时党证、执委证书都丢弃了，再不到县党部登记了。从一九二六年七、八月间到一九二七年十月，我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上了第一课。

中国为什么降到半殖民地的地位？就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的结果。军阀统治下的苛捐杂税、暴政如虎，我是深刻认识的。

我在海外住了七年，看到华侨地位不如欧美人，不如日本人，甚至也不如马来亚人和印尼人，民族意识强烈的滋生着。但最初只和接近的朋友发泄不满情绪，思想上并没有明确的观点。

学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，对它的民族、民权主义就完全信奉了，认为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，必须推翻军阀统治，才能建设国家。对于民生主义，我当时还搞不清楚。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我当时是信奉的。但是回国后看到国民党也和从前军阀一样腐败。我在失望之余，自己找到一个答案，就是人民群众还没有起来。为什么人民群众没有起来呢？就是还没有觉悟。是什么障碍人民群众的觉悟？就是文化落后。我当时的结论，就是要普及发展教育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，进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。

我当时想办学校，并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张本。那时我的思想是幼稚的，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，只凭愿望和一股热情，因而在办学过程中就难免受到阻碍和挫折。

一九二八年，我第一次带着组织校董会的任务到新加坡后，遇到一些流亡的革命青年。我很想了解共产党的主张，但通过好几人去找书都找不到。我在新加坡时读了一些蒋光赤的文艺作品，如《少年飘泊者》、《鸭绿江上》等，追求光明的心火是旺盛的，但找不到门径。一九二八年冬天回国，我在一位教员家里读到彭湃同志写的《海陆丰农民运动记》，很佩服彭湃同志那样全心全意为农民谋福利的精神，但追问下去时，没人回答了。

一九二九年四月间，我到菲律宾，接触了许多新文艺书籍，“创造社”出版的书我都读了，很想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。大约两个月后，由林恒耻介绍了一个叫沈天渊的青年店员与我认识。我就从沈处读到许多秘密出版的书籍。我读了瞿秋白同

志在“六大”作的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》的报告，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战略与策略》，读了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报告，也读了彭述之的《中国经济状况》等。这些书籍、报告，帮我在思想上解决了许多问题。

我初步了解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反帝反封建。了解中国共产党的“二大”的最高政纲，是实现共产主义，了解到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。这时我思想开通了，心情全变了，感到自己有能力可以担当一部分责任，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。

我继续跟沈天渊来往，到菲律宾后结识的几个青年也都成为沈天渊的朋友。我常对沈表露要找共产党，要从他借给我的书解答些问题。但没有想到沈天渊当时就是共产党员（以后当叛徒）。

我跟沈天渊认识四个多月后的一天，记得是九月中旬，沈天渊约我到海滨公园散步。两人按时到碰头的地点，在海滨堤岸坐定后，沈首先对我表白他就是共产党员。他告诉我，党组织已审查了我的家庭成份、经济状况、本人出身和经历，社会关系和政治态度，批准我入党，并告诉我党的组织纪律。我听了之后，感动得跳起来，紧紧地抱住他。

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，我参加了入党宣誓的仪式。

一九三〇年初当我准备回国时，党组织负责同志林清秋约我谈了几次话，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和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工作应注意的问题。

一九三〇年三月，我从马尼拉回到厦门，由菲律宾华侨党组织介绍给福建省委。我到厦门后，很顺利地找到负责和菲律宾联系的董云阁同志（青年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）。省委最初由他和我联系。了解情况后即由省委秘书长吴××同志跟我谈话，传达